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第一辑

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论

于述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22144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第一辑

G529.7

01

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论

于述胜◎著



北航

C16317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529.7
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论 / 于述胜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518 - 3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教育史—研究—
中国—现代 IV. ①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919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

总 序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高等学校，一百多年来，先后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史学者，形成了丰富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全国的教育史学科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就在全中国率先创建了教育史教学组。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邱椿教授、毛礼锐教授、邵鹤亭教授、陈景磐教授、瞿菊农教授等一批教育史学者齐集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全国一流的教育史学术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殚精竭虑，著书立说，培养后学，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教育史专家。

近三十年来，以王天一教授、张鸣岐教授、夏之莲教授、吴式颖教授、朱美玉教授、高奇教授、王炳照教授、刘德华教授、郭齐家教授、何晓夏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代教育史学者继往开来，锐意进取，重建和振兴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通过队伍建

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继续保持了自我发展和不断更新的良好态势。2001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主要以原教育系一个教研室的力量为基础申请国家重点学科并获得批准。2007年被再度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20世纪末以来,老一辈教育史学者相继离开工作岗位,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如何在老一辈教育史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事业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和知识进步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教育史学科发展,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继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如何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科积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更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式?如何通过学术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推进教育史课程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功用?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教育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作为解答上述课题的努力,经过反复论证,我们确定以“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今后若干年内的主要研究领域。之所以确定这一研究领域的原因是,首先,有助于开辟教育史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自有人类以来,教育始终是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紧密相关的。教育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相互关系的视角开展教育史研究,有助于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扩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探寻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丰富教育史研究。

其次,有助于拓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将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通过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不同时期和教育的影响,研究教育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有利于消除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之间的界限。

第三，有助于发挥学科优势，产出重大成果。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历来注重历史文化的积淀，注重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发挥学科传统优势，加强团队合作，协同开展攻关，实现学科建设的目标，产生重大的研究成果。

“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是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三期“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与中国教育创新基地”的建设项目之一。本丛书是这个项目建设的主要成果。我们计划在今后几年中，分辑陆续出版，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团队的工作成果，以就教于教育史学界同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以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学者的优秀成果享誉学林。“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丛书的出版，得到该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2年8月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重塑中国教育学的自我意识	(6)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意识”浅析	(6)
一 历史意识中时间的意义:过去、现在与未来	(9)
二 历史意识中知识的意义:历史事实、历史思维 和历史观	(13)
三 问题意识体现了历史意识的超越性	(15)
四 人文意识是历史意识的“价值—精神”向度	(17)
第二节 从教育学史到教育学术史: 重塑自我意识的可能选择之一	(20)
一 中国古代学术与现代教育学传统	(22)
二 是否应该及如何将传统教育学术纳入研究视野	(30)
第三节 以通人之眼治专家之业: 重塑自我意识的可能选择之二	(37)
一 跨跃学科边界的思考举隅	(38)
二 以通人之眼,治专家之业	(42)

第二章 民国时期教育与教育学散论 (48)

第一节 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的中国问题——以舒新城的

中国教育史研究为个案 (48)

一 从教育方法转向教育史研究的历史象征意义 (48)

二 《现代教育方法》：“传统教育精神”

与“现代科学方法” (52)

三 《近代中国留学史》：“接受教育”与“研求学术” ... (58)

四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直线”与“曲线”的寓意 ... (63)

五 中国问题及其问题 (70)

第二节 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 (77)

一 从“二分法”到“三分法” (77)

二 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论—实践”观念 (81)

三 作为其实践基础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国家规划 (86)

四 随着研究重心的不断下移，“思想”与“制度”的

边界开始交融并合—于行动的世界中 (92)

第三节 学术与人生——以舒新城的道尔顿制研究为

个案 (98)

一 新、旧两种教育经验所构成的思想底色 (101)

二 道尔顿制研究中的“心理”与“学理” (109)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

为中心的多维分析 (116)

一 “社会教育”：一个处在流变过程中的

历史概念 (118)

二 社会教育的功能：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 (125)

三 社会教育的主体：知识分子与国家

和地方政权 (131)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的话语分析 (138)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60 余年来

中国的教育学话语史论 (139)

一 一元化体制与“元理论”的形成和演化 (139)

二 从“元理论”到“元教育学”再到“教育理论

回归生活世界” (150)

第二节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的教育学话语与

教育学变革 (162)

一 20 世纪 80 年代:反政治化的政治化 (164)

二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化与专业化 (174)

三 21 世纪头 10 年:超越知识的文化追求 (188)

四 接着往下说 (203)

第三节 从“书院精神”到“大学精神”:

思想谱系与学术表达 (207)

一 从“书院陋习”到“书院精神” (208)

二 从“教育规律”到“书院——大学精神” (216)

三 “大学精神”的另一种探寻:以陈平原的

《大学何为》为例 (220)

第四节 近 30 年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

不同理路 (235)

一 由论而入于史 (236)

二 由史而进于论 (239)

三 在同情与体贴中切近传统 (242)

四 笔者的观感与体会 (245)

附 录 (249)

一 一则教育学故事 (249)

二	“愤懑的沉默”——邱大年先生的精神肖像	(255)
三	真正的学者——追慕陈友松先生	(262)
四	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	(282)
五	教育学术应该这样争鸣	(306)
六	在积累与反思中深化教育现代化史研究 ——兼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	(310)

自序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研究。这本小书，是相关研究成果的汇集，也是2009年被列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终期成果。在她付梓之际，我也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在浩瀚无际的中国教育学术海洋里，她不过是摇来晃去的一叶小舟，微不足道。但对于自己屈指可数的学术生涯来说，她却非比寻常，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无尽追忆。

1981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始了自己一片茫然的专业学习——入学前既不知将来的出路如何，更不知所学将为何物。幸运的是，那时的大学老师们都很敬业，而作为学生的我们又格外勤奋。几年下来，我感觉最大的收获是养成了对于中国教育史的浓厚兴趣。兴趣的养成，首先与赵一民、郭令吾两位先生的精湛教学有关。赵先生教中国古代教育史，郭先生教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两位先生上课是从来不带讲稿的：经典、文献之言已烂熟于胸，讲授之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们对于历史、文化的那般体贴，让你觉得他们已与历史人物合而为一：他讲孔子，你会觉得他就是孔子；讲蔡元培，你会觉得他就是蔡元

培……当然，那兴趣大概也关联着自己的性情。学心理学，试着给自己进行智力倾向测试，结果显示：我是适合做历史研究的。于是，大学毕业前夕，我义无反顾地报考了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了赵、郭两位先生开门兼关门的弟子。

虽说性近历史，但真正让我钟情的还是思想史，至于充满考据色彩的制度史，我始终是敬而远之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三年，我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读《老》、《庄》之书上，并以《艺术化的教育——〈庄子〉教育观探析》完成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记得硕士毕业前夕，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应考博士研究生，曾将油印的硕士学位论文上呈张瑞璠先生，乞予指导。张先生确实很认真地审阅了那个不像样的东西。两天后我登门求教，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吗？”这话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庄子》作为先秦时期最有文采的作品之一，终究对我有所熏染；忧的是，分明是一篇以说理为主的学位论文，怎么能让先生觉得像是文学作品呢？

接下来的三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李国钧先生攻读宋明教育史。部分是为了矫正自己思维过于“文”化的偏差，部分是受几位师兄（如吴宣德、黄书光）的影响，我把研究方向定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思辨色彩的宋明理学教育哲学研究上，并以《朱熹教育思想体系发微》完成了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李先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学三年，先生言传身教、反复叮咛的，无非是这样几句话：要大量阅读历史文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在以“思想”见长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并未觉得这话有多么了不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与日俱增。

1991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如期毕业。在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也让我感觉最为妥帖的一句话，还是出自作

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张瑞璠先生之口：“论文的思辨性很强。”这让我如获至宝：自我思维矫正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迅即，我开始了在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为期10年的任教生涯。说来也巧，当时的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在陆有铨教授的引领下，为了继承由傅统先教授所开创的教育学传统，也是为了学科和学位点建设的需要，把教育学原理专业的主攻方向定位在教育哲学研究上，遂形成了这样的分工：陆先生牵头主攻西方教育哲学，我和随后留校任教的于建福君则在潘伯庚先生的带领下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虽然不久陆先生因故调赴上海，但这样的分工竟多年未曾改变。于是，我便沿着“逻辑+思辨”的道路，在传统教育哲学领域缓缓前行，一走便是10年。

2001年，王炳照先生在几经周折之后，把我从山东调到了北京，让我得以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为了平衡中国教育史的学术发展方向，王先生让我转向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说老实话，到京的最初几年，我颇为茫然，不晓得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通往何方。终于，一个偶然的会让我茅塞顿开。2004年，我出任一份文化报——《读书时报》的主编，得以与北京学术界一批十分活跃的青年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永捷、干春松博士等相识，有机会向一些学界名宿如钱逊、周桂钿、程正民、李汉秋等先生请益，并开始关注陈平原、汪晖、桑兵、罗志田等学界先进的学术成果。由于经费等原因，我主编《读书时报》前后仅有一年，但这段经历却让我的学术思考发生了若干重要转变：

其一，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必得跨越学科边界，在大学术史的视野中予以审视。我的《探寻中国教育研究的民族话语》、《跨学科视野中的百年中国大学研究》、《从教育学史到教育学术史》等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这也开启了我走向教

育学术史研究的新途。而已往思辨哲学的历练，正好可以作为一种铺垫，让我在把握不同时代的学术话语上展其理论抽绎之所长。

其二，在中国文化教育日益大众化的时代，学院中的学术思考要获得更大的社会和文化感召力，必须调整学者的研究姿态和表达方式，以人文化的方式去切近大众（包括学术大众）的情感与生活。在这方面，陈平原给出了很好的榜样。我先后发表于《读书时报》和《中国教师》上的若干文化、哲学和教育随笔，便催生于此。通过写作实践，我开始摆脱干涩的思辨而趋向哲学与文学的交融，并得以体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

上述转变，恰似一条红线，将我8年来有关教育学术史探究的若干论文联为一体。虽未成一家之言，却自有其心神所系、愚者千虑之一得，不忍妄自菲薄。这是北京特有的学术氛围给我的最大恩赐，怎能忘怀？

本书附录中的几篇文章，都与中国现代教育学术有关。之所以将其列入附录，是因为前4篇乃随笔性作品，第5篇为访谈体，末篇又为书评体，它们与正文的整体风格不相协调。其中，《傅传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原刊《教育学报》2010年第5期，复收入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今又将其收入此书，旨在表明笔者近3年来学术史与口述史相结合的探索新路。而最末的书评，乃基于教育史学者间相互关注和理解之需要而写，旨在从学理层面去探讨教育现代化史研究的深化之道。

“八年抗战”，得收此果。是非得失，自当由学界同人评说。笔者在此，谨将其来龙去脉向读者诸君略作汇报而已。前段时间，某领导同志与我絮谈，其言曰：“述胜君，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现在不少专家学者囿于狭隘的学术小圈子，十几二十人窃窃私语。其高者，彼此吹捧，自娱自乐；其卑者，相互诋毁，唯我

独尊。如此学问，有意思吗？”此语虽失之偏颇，却也不无洞见。笔者更加担心的是：小圈子与小利益扭在一起，有术无学、把持学界，功夫全在诗外。此绝非中国教育学术之福。君不闻“这圈那圈，到头来都是花圈”吗？“知天命”之年，理应在当为与可为之间找到适切的交合点，也好向“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从容迈进。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可不勉。

第一章

重塑中国教育学的自我意识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历史意识”浅析^①

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历史意识”、“历史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所强调。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也成了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细听相关谈论，我发现：谈论者往往把“历史意识”当作未经反思的自明前提，在未明了何为“历史意识”的情况下，就提出了一系列“丰富、提高、增强历史意识”的行动方案。但是，作为自明前提的那个“历史意识”，又常常晦暗不明，让人疑窦丛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较早提出“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问题的，是何齐宗。他在《教育评论》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简论教育科学的历史意识》一文，文章指出：

^① 本节主要内容曾以《也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基于教育研究的理论思考》，发表于《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

教育科学是人类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教育科学历史意识的实质，就是通过研究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认识教育科学发展历史的一般进程和基本规律。^①

这实际上是把“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看作对于教育学史的认识。

其后，郭元祥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1期上发表了《论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与逻辑意识》。作者以“历史—逻辑”的二元区分为前提，演绎出“教育历史—教育逻辑”的范畴，进而又演绎出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逻辑意识”，而其问题意识则在于对历史与逻辑进而观点与材料相割裂的实践反思：

在处理教育的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教育研究中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有的缺乏历史意识，教育历史消失了；有的只是把教育的历史作为论证的辅助材料或证据，历史仅仅作为“事实”用来作证；有的只是把教育的历史作为一种“金矿”开采，一味挖掘教育历史材料，忽视教育历史的逻辑必然性……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历史意识与逻辑意识的问题。^②

尽管上述论述存在诸多逻辑含混之处，但大致可以断定，作者所

① 何齐宗：《简论教育科学的历史意识》，《教育评论》1989年第2期。

② 郭元祥：《论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与逻辑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1期。